

史科学概论

谢国桢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艾料学概论

谢国桢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科学概论 / 谢国桢著.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200-11044-9

I. ①史… II. ①谢… III. ①史科学 IV. ①K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3038 号

史科学概论

SHILIAOXUE GAILUN

谢国桢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 bph. com.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本 7.125 印张 180 千字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11044-9

定价: 42.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序 言

史料学是史学辅助学科，是研究处理史料的原则和方法。史料来源包括文字的（各种文献书籍及铭刻）、实物的（出土文物和考古遗迹）以及民间口传的。自从有史料存在，就出现了史料学研究课题。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上，把周秦百家诸子的学派分为九流，汉刘向、刘歆父子总结过去整理的成果，刘向著有《别录》，就是书籍的提要，刘歆又把书籍编成目录，叫作《七略》，为后人开辟了治学的道路；宋代郑樵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元初马端临主张“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驳”，把史料学研究推进了一步；明、清两代学者，整理编纂史料尤勤。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们的方法还是不甚完备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搜集和整理史料，鉴别其真伪，批判地接受其有价值的东西，为史学研究服务，就成为史料学的任务。诚然，史料学与考古学、档案学均有着密切关系；又由于吾国古代书籍浩如烟海，史料极其丰富，因之就出现根据内容分类编目的问题，而流传下来的书籍亦有文字异同之别，版本校刻优劣之分，所以史料学与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也都有着密切

关系。

枬素来喜欢读史部书籍，早在五十年前服务于北平图书馆时就从事于编目工作，稍泛览于群籍，当时不过是涉猎篇章，看其序目，见首而不见尾，粗知其梗概而已。后来忝列上庠，讲授史学源流，只因学识谫陋，起初仅据郑鹤声先生《史部目录学》作为讲义，铺陈了事。假若有一知半解，也是受郑鹤声先生启发而来的。解放以来，承党的关怀和同志们的督策，得以历次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讲授这门课程，从史学发展这方面着手，简介史学基本知识、前人研究的成果和新发现的书籍以及出土文物等，概括地说明史料的源流、价值和运用方法。通过教学，日积月累，讲稿时有改订。后来把这些破烂的讲稿搁在箱子底下，久而不去过问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史学领域也日益繁荣，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为了给有志于治史的青年提供历史文献的基本知识，在白寿彝同志的鼓励下，以早些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授课的讲稿为基础，进行修改和增订，定名为《史科学概论》。我的助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韦祖辉同志，也为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本书分八章写成。头两章分别介绍史料的来源、形成有关目录学方面的知识；其后三章按时间顺序，依次概述，可得知其发展趋势；第六章介绍与史学关系甚密的金石考古和地理方志方面的知识；最后两章分别概述古书辨伪和辑佚方面的知识，以及有关丛书、类书和工具书的情况与治史的方法。由于这次时间仓

序 言

促，谬误之处一定不少，诚恳地请教于读者，容俟再版时订正和补充。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谢国桢记于北京团结湖畔之瓜蒂庵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史部书籍的来源和形成	1
一、引论	1
二、“史”字释义	2
三、史料记载的形成	4
四、由铭刻到绢帛、汉简和卷轴	4
五、由书写到版刻	7
六、书籍的体裁和目录的编制	9
第二章 目录学的发展及其流派	12
一、史料的发现及“流略之学”	12
二、目录学的流派	14
（一）官藏的古籍	14
（二）史志	17
（三）私家藏书目录	18
三、结语	20
附：黄侃七略四部开合异同表	22

史部诸目同异分合表	24
第三章 周秦至魏晋南北朝史学源流和重要史籍的介绍	26
一、史部的源流和类别	26
二、周秦以后的古代史乘	29
三、通史而兼纪传体《史记》的出现	37
四、断代史的《汉书》	43
五、《后汉书》与《三国志》	49
六、《晋书》与南北朝史	57
七、近三十年来地下出土魏晋以前重要史乘简介	63
第四章 隋、唐、宋、元重要史籍介绍	67
一、唐修诸史	67
二、《旧唐书》与《新唐书》	70
三、唐代其他史乘	73
四、五代十国的史乘	77
五、《宋史》	81
六、《资治通鉴》和其他宋代史学著作	83
七、辽、金、元史	92
第五章 明清重要史籍介绍	105
一、明清史籍的特点	105
二、《明史》	108
三、有关明代的其他史乘	114
四、关于清史资料	126
五、清代史乘发展的情况及近代史资料问题	139

目 录

第六章 史料学的邻近学科：金石学和地理方志学	149
一、金石学	150
二、地理方志学	158
第七章 史部类书、丛书、校勘、辨伪和辑佚书	172
一、类书	172
二、丛书	178
三、校勘、辨伪和辑佚书	184
第八章 史学研究方法和工具书的使用方法	196
一、关于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	196
二、工具书的种类及其使用方法	199
三、学习和研究史学的方法	214

第一章 史部书籍的来源和形成

一、引论

祖国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史部书籍，浩如烟海，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就有史迹的流传。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到封建社会，历史记载逐渐发展起来，数目非常繁多，中间虽屡遭兵燹水火，所谓书有“七厄”，颇有散佚，但是流传到现在的，还是非常宏富。可以说，我国自有文字以来，一直到现在，四千年来史迹留存接连不断，这是世界上所罕见的，也是值得自豪的。

这一大堆史料，虽然多半出于统治阶级士大夫之手，主要是记载“国宪家猷，朝章典制”的事迹，但是也反映了劳动人民创造的伟绩、科学技术的发明、阶级斗争的事实、边疆舆地各时代的情况，等等。这些丰富的史料，就好比一座宝库，里面琳琅满目，五色迷离，非加以编排整理不可。没有入门的途径和钥匙，这宝库的

内容是无法看到的。学习史料学，就是研究历史的必经门径，也可以说是打开史料宝库的一把钥匙。

历史这一门科学，是由简单而到复杂的。研究各时代史学家和史学发展情况的，属于史学史的范围，但是研究史料学也不能不涉及。就史料而论，所谓“旁宗之子，蔚为大国”，由“九流七略”发展而为经、史、子、集四部，具体到史部上来而有纪传、编年、纪事本末等各种各样的体裁，以及经济、政治、舆地、金石考古各种各样的专科书籍和古代遗物等，研究和编纂这些方面的史料就是史料学的任务。换言之，综合上述史料研究和编纂的成果的就是史料学。同时史料学也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这是因为史料来源是多方面的，而史料学的发展是与史料的搜集、校勘、编纂和考古发掘成就分不开的。史料学与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同属史学辅助学科。史料学的主要任务，正如宋代史学家郑樵所说“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把搜集来的史料经过校勘辨伪，鉴别其真伪，利用有价值的史料为史学研究服务。本书编辑的宗旨，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地说明史料学的基本知识，分别其门类和部居，对于史部重要书籍以及目录学著作作简明扼要的介绍，分析其内容而批判地接受其事实，作为读书的门径，以期符合于古为今用之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史”字释义

我国最早的文字学著作——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这

本书里提到，黄帝之史官仓颉，“初造书契”。与许慎同时代的应劭著《风俗通义》，也说黄帝时的史官有仓颉、沮诵。《周礼·春官大宗伯》说周代有大史、小史、冯相氏、保章氏、内史、外史、御史等官职。《说文解字》上解释“史”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含有史官秉持中正的意思。我们试想在上古奴隶社会时期，哪能有这许多的史官建置？又哪能有秉持中正的史学？这不能不令人发生疑问。王国维先生《观堂集林·史籀篇证序》说：“《史籀篇》为字书之通名，犹汉时间里书师呼《爰历》《博学》二篇为《仓颉》；魏晋以后，并呼扬雄、班固、贾鲂之书为‘三仓’。”据此，《仓颉篇》应为汉代通行文字之书，而非仓颉做史官时所创造的文字。王氏从而对于《说文解字》秉持中正的“史”字，也别具新解，他著有《释史》一篇，引申了吴大澂“‘史’象手执简形”的说法，他说：“案《周礼》大史职，凡射事饰中舍筭……是中者，盛筭之器也。”“筭”也可以作“策”，是计数的木签，“中”字在文字学上作十字状，就是持筭之史。在原始社会游牧时期，从事于狩猎，责成专人手持着计算的器具，计算狩猎所获的物品，那就是小史。这一解释与当时的狩猎的生产方式相联系起来，是比较正确的；若是照旧的解释，所谓中正，乃无形之物，怎么能手持呢？显然是不合理的。随着社会物资生产的发展，人们由计数而铭刻在陶器、石器或兽骨上，给后代留传下来许多的象形文字和铭刻。这是文字的起源，也是记录史事载籍的起源。

三、史料记载的形成

在夏代以前，铭刻在陶器、石器上的花纹较易见到；至于铭刻的文字或直接的史料则很难见到。殷墟书契就是铭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近人罗振玉和王国维先生所著《殷墟书契考释》把殷商时代占卜的事实约分为九类：“曰祭、曰告、曰享、曰出入、曰田猎、曰征伐、曰年、曰风雨、曰历。”殷代的帝王、年代、都邑可以在这里看出，足以补史乘之未备，同时也反映了由渔牧狩猎发展而为农业生产的历史过程。这也证明《周礼》所记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虽然《周礼》把古代朴素的事实加以渲染和美化，但也说明古之史学出于王官之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四、由铭刻到绢帛、汉简和卷轴

如上所述，我国最早的文字记载，是铭刻在陶器、石器和兽骨上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即封建社会初期，农业生产日益发达，事务繁兴，简单的文字语句逐渐演变为长篇累牍的文献记载，汇编起来而成为书籍，乃由铭刻而转写在木简的版片或绢帛上。如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所谓笔是用漆来写字，所谓削就是写错了用薄刀把它削去。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就是指古代的典籍《河图洛书》。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指出，《河图洛书》大概就像

明代记载人户田地的簿子黄册和地图书之类。至于经传的流传，章炳麟先生在《国故论衡》里写道：“经为二尺四寸之简，《论语》一尺二寸之简，传者纺专也。”这是经传的来源，其写作体制上的本意，并不是后来学者所解释的什么经天纬地的法则，所谓经典，乃是后人推崇古人的著作而赋以新的意义的。由木简和绢帛的传写，可以看到吾国书籍名称演变的痕迹。

一、简牍的编制。古人把竹头木片削成长条或长方形的简策，经过炮制，使之不致欹斜不平，即所谓“汗青”，再用四片薄板束着毛颖制成的笔（因为近来在新疆居延地方发现了这种样式的笔，就叫它“居延笔”），蘸着漆墨来写字，这是经过一个艰巨的历程的。至于简牍的格式，据近来在新疆、甘肃、敦煌迤北的长城、罗布淖尔的古城发现的大批汉晋古简，王国维先生利用这些实物再印证古籍而编写了《简牍检署考》。他解释古隶的书册的“册”字，就是用细绳捆着许多木简的象形字，编起来的木简，就叫作册。至于木简的形式，大约简长二尺四寸，最短的四分取一；牍长短与简相同，而宽为简的五倍。王氏称简是秦制，牍是汉制，可见简牍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连篇累牍叫作策，也叫作算，古人是用筹算，记载数目也是写在竹简上的。用较大的简能书写整篇文字的叫作律，大半用于军事行动上，所谓“急急如律令”。这些简牍编好之后，用木板封括起来，叫作检；用帛封括起来，叫作帖；用绳结起来而加上用泥做的戳记，叫作封泥，一般钤盖有发出的人名和地点。清同治光绪年间在山东登莱一带发现了很多封泥，清代学者吴式芬编为《封泥考略》，足以考证秦汉时代的封爵和地名。还有为儿童习书用的籥、筴、觚，汉人

史游《急就篇》所说“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就是这个意思。觚的形式是一块六面或八面的木头，既可以多写字又可以磨去，为简便的习书用具。自晋代以来发现的木简很多，就最近发现的木简来看，其内容包括文书、檄书、簿册、经籍、历法、医方杂录等各方面的记载，是研究吾国古代史的主要资料。

二、卷轴的编成。书籍记载写在绢帛上，可能晚于简牍，但是在汉代写在木板上的简牍与写在绢帛上的卷轴是并行的。汉末董卓之乱，东汉政府从洛阳迁都到长安时，曾用经典载籍的卷轴作车帷。东汉时期，蔡伦积累前人的经验，发明了造纸的技术。最早的纸叫作“赫蹄”。到了东汉末年，纸已经普遍使用。所谓版本，原来是指简牍，后来一人持本，一人读书，就把它校讎写定在纸制的书卷上，因而纸写的书卷就称为本了。汉晋以后，简牍逐渐废除，而专用纸写的书卷，到了唐代，纸写本的书卷风行一时。在公元十九世纪末，甘肃敦煌莫高窟里发现了壁画和大批写本的书卷，其中除了佛经而外，还保存了早已散佚的书籍、重要的文件和资料，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成为专门的研究项目。总之，由于纸的发明和使用，文化的传播就日益推广起来，书籍的名称便由篇、册演变而为卷轴，携带也便利了；但是也有它的缺点，因为每一轴只能写一卷书，用绢帛写的也是这样，那时大部头的书籍如《史记》《汉书》之类，每卷多为单行，如《汉书》的《食货志》《霍光传》等皆有单行之本，可是极易散佚，这是其美中不足之处。

五、由书写到版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在唐朝末年书籍便由书写的卷子本发展而为木刻的卷子本，最后乃演变而为折叠本的书籍。木刻本的出现，固然主要由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但也有政治和宗教上的因素：一为翻印日历；二为大量印刷佛经。日历为中国人民所需要的物品，在唐朝，日历属于政府专卖，统治者为了大量翻印出售，就不专靠写本而采用木刻。佛教在唐朝十分盛行，唐玄奘向印度取经，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为了宣扬教旨，采用了比较先进的方式，拿木刻印刷来广泛传播。上举事实，可以证明唐朝已出现了木刻印刷。

我国新疆地区曾发现隋末高昌延昌三十四年甲寅（五九四年）所刻的木牌，上刻“家有恶狗，行人慎之”八字。唐时元稹《白氏长庆集序》称：白居易诗集经“缮写模勒，街卖于市林，或持之以交茗酒”。可见当时白居易的诗已有刻本。又唐诗人司空曙《一鸣集》，曾提到僧忠惠刻经文律疏八百纸，由此证明，早在唐朝末年已有刻书流传。有人据宋太平兴国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雕版的佛经《大随求陀罗尼经》，认为大随是指隋朝，因之论断隋朝已出现了木刻印刷。其实“大随求”乃是大自然的意思，不可断句为“大随”。说隋朝已有刻本，是没有根据的。

宋、元、明以来，刻书有重大的发展。北宋时期，刻有十三经和十七史。南渡以后，由于东南沿海经济的繁荣，雕版印书也极为发达，形成三大刻书中心，即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阳和四

川的成都。当时有官刻本（监本）和书坊的书棚本，并且出现规模较大的手工业刻书作坊，刻工多至百人以上。在雕版技艺上，浙、蜀为佳，建阳的称“麻沙版”，比较潦草，但其特点是刻书种类多，有礼书、乐书、药方、小说以及可称为日用百科全书的《酬世大全》等。由于雕版印刷的发达，当时还有不少书籍流传到国外，如日本、朝鲜等国，都收藏着宋朝的刻本。其影响到各兄弟民族的，在东北的女真族（金），后来统治了华北，在山西平水就出现了金刻本的书，是为“平水本”。这种版本目前发现的有两种：一为当时民间流传的戏曲《刘知远诸宫调》，另一种是山西赵城县发现的金刻本《大藏经》。到了元朝，刻书也很发达，在未统一中国以前有蒙古本，如现存蒙古中统刻本的《史记》。其他元朝刻书，流传下来的也很多。

北宋庆历元年（一〇四一年）还出现了毕昇发明用胶泥做活字版的印刷事迹，成为我国闻名于世界的四大发明之一。元代活字印刷有新的成就，延祐元年（一三一四年）王桢著《农书》，自制木活字印刷。到了明朝，活字印刷尤为发达，有无锡华氏会通馆、兰雪堂用铜活字排印的《艺文类聚》等书流传于世。

到了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我国刻书业出现了新的高峰，当时有五个大城市为出版的中心区域，如北京的金台汪谅，他刻的书并附有广告；苏州、杭州、徽州和成都，都刊刻了各种各样的书籍。这时刻书业已经有了分工，如刻工、编辑、书肆主、出卖著作的作家等。在雕版艺术上也有新的特色，有五色套版和雕镂精工의 版画。明末著名的刻书家有闵齐伋和毛晋，刊刻经史子集之书，非常众多。毛氏到福建定制大量的印书纸张，所以有“毛